

与浩然在一起的日子

苏宝敦

1974年，当时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站”(今区文化委员会前身)，根据当时房山县革委会文教组的指示，组成一个写作组，深入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单位岗上村，撰写全国劳动模范吴春山的先进事迹。

写作组由赵日升、曹岫森、苏宝敦三人组成，深入实际，访贫问苦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，进行详细采访。吴春山当时五十多岁年纪，黑红脸，方圆脸庞，体格健壮，嗓音洪亮，讲起岗上村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创业史滔滔不绝，谈起个人的“苦斗经”更是豪情满怀。他对我们说了这样一个细节：那时他是牲畜把式，从河套沟往涿州运煤，三九寒冬，半夜上路，山风扑面，冻得两脸疼痛。夜里从煤场起程，天亮进涿州城，路边有卖“大碗面”的，一碗一斤，因是常客，人熟路熟，提早做好准备，走到与“面摊儿”一定距离时，将鞭杆儿插入腰间，从口袋里掏出硬币，边向“面摊儿”扔去，边高声喊叫“大碗面一个！”而后紧走几步，端起大碗面，狼吞虎咽，吃入口中，转回身，继续跟着骡队前行。

采访将近一个月时间，原《十月》副主编张守仁来到写作组参加编写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浩然先生来了。他坐的是一辆绿色军用吉普。住下之后，与我们编写组交谈起来。他说他用报告文学形式写了大兴县的王国福、长工屋，很受



感动。我们就和他一起去看吴春山的住房，也是一间长工屋，屋里的墙壁油黑发暗，墙壁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画像。谈起如何写好报告文学，他说：一要真实，不要像写小说那样编故事；二要写好人物，你们写岗上村的发展变化，重点是写好吴春山；三是文章中要体现出人的精神风貌，把人内心世界的高尚情

操写出来。他还说，有些工农兵英雄人物只会做，不会说，你们要善于引导，比如你们想好一句能表达某个人物思想的一句话，先讲出来，问他是不是这样想的？他说是，就可以用。谈起他个人的小说创作，浩然更是滔滔不绝。他说他进入创作状态后，如小河流淌，自然成文，一天能写七八千字。张守仁先生插话说：我这个编辑审稿子，还跟不上你这个大作家写稿子快。于是，我立即想起第一次见到浩然时的情形。

1975年，我有幸作为一名业余文学作者参加北京市的一次文化工作会，浩然先生坐在主席台上，40多岁年纪，风华正茂，英俊潇洒。我当时已读过他的

《喜鹊登枝》、《艳阳天》等作品，令我十分羡慕。

在岗上村与浩然二次相见，面对面听他讲创作，讲人生，实在受益匪浅。第三次与浩然在一起是1991年。《农民日报》文艺副刊在“北京欧美同学会”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，我与浩然邻座，相互交谈很方便。近20年没见面，他一眼就认出了我，很热情地和我握手，很亲近地与我交谈。我祝贺他的新作《苍生》面世，他诚恳地对我说：“在新的时期，我如果写不出《苍生》，作为一名作家，我就彻底‘破产’了。”接着，他问我的情况，我说已写出长篇小说《柳溪轶事》，出版社正在编印。他问我是怎样突破“三突出”框框的？我说我以一个乡为背景，真实地记录从1978到1988这十年间所发生的典型事件，在典型事件中各样人物的真实表现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，性格特征，没有特意“拔高”某些人。他点点头说：“书出版后赠我一本。”接着，将通讯地址写给了我。

1992年，《柳溪轶事》出版后，我邮寄给自己尊重的三位著名作家，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点评。刘绍棠先生写了《喜读〈柳溪轶事〉》，许谋清先生写了《苏宝敦的柳溪轶事》，浩然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函。信个说：“赠书收到，谢谢你！我在病中，看来非短时间可以痊愈的。因此研读长篇小说有困难……希望得到你的谅解。……浩然，1992年，4月1日。”这封信，至今我还保存着。

2008年，浩然先生不幸离世。从1992年起，在这16年的时间内，他与病痛争斗，为文学“绿化”工程默默出力，在北京郊区业余文学作者中，他是一代楷模，他将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农村业余文学作者的心目中。